

論析野戰戰略「戰略態勢評析」 在現代戰爭中的新概念

作者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上校副院長 歐陽國南

提 要>>>

- 一、判斷「利害得失」與「風險評估」為一種「戰略決策」的思維與邏輯。正確的決策評析有賴周延的環境評估與完善的風險管理，野略的「戰略態勢評析」之著眼即在於此。
- 二、野略「戰略態勢評析」考量的基本因素有四；第一、敵我雙方兵（戰）力的比較；第二、雙方兵力位置；第三、雙方兵力位置與補給線的關係；第四、爾後的發展。
- 三、野略「戰略態勢評析」在當代的應用上應增加「決策管理」與「淨評估」思維、兵（戰）力的估算須轉變為「資本」增減的概念，兵（戰）力的位置亦須朝向「場域」的意涵轉換，後勤更須具有「精準式」與「效益式」的後勤的觀念。
- 四、「爾後發展」因素的思考不能僅考慮純軍事的因素，而必須思考關於可能影響戰爭結果的因素，才能在達成最終決策過程中，保有較為寬廣的視野和務實的方法。

關鍵詞：野戰戰略、戰略態勢、決策、兵力部署、現代戰爭

前 言

大軍作戰，首重安全。兵力部署首需思考「如何使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爾後

再圖謀破敵制勝之道」。誠如孫子所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兵勢篇〉；「先勝」或「先戰」，取決於指揮者的利害判斷與風險管理是否



得當。

判斷「利害得失」與「風險評估」為一種「戰略決策」的思維與邏輯。正確的態勢評析有賴周延的環境評估與完善的風險管理，野戰戰略（以下簡稱野略）「戰略態勢評析」之著眼即在於此。「判斷」、「評估」、「風險管理」同時也是思考兵力部署的第一步驟，研究重點著重於分析外部、內部的優劣形勢與機會和威脅因素，以為全般的作戰指導樹立良好之基礎。

現代戰爭儘管科技武器裝備與傳統戰爭¹差別甚巨，但兩者的作戰概念仍必須依評估的思維方式，以產生擊敗敵軍或達成戰爭目標的策略與手段。傳統戰爭的野略「戰略態勢評析」重在戰場內或戰場附近的環境評估，評估的結果引導指揮者完成初步作戰概念，作為全般作戰指導的方針。由於傳統戰爭大多為正規作戰型態，戰場環境也因情蒐工具不足導致敵情未能充分掌握甚至透明下，「戰略態勢評析」僅能做到「粗」略的分析。相反的，現代戰爭受惠於資訊科技與高科技武器的進步，戰場界限已無遠弗界，透明程度更較以往明晰，「戰略態勢評析」必須講求詳「細」的研析。雖然，「粗」略的或「細」部的「態勢評析」，其差異在於工具（科學管理模型）使用的不同。然而，戰場整體環境的掌握才關係著作戰概念的辨識是否正確，資訊科技

雖可幫助對戰場環境的認知，但是仍不免存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在雙方自由意志發揮之下，正確的態勢判斷則有賴作戰行動者（指揮官及參謀）的戰略素養。

本研究是以傳統「戰略態勢評析」的四項因素作為研究起點，將現代戰爭的戰場環境與造成戰爭型態轉變的改變因素作為「應變」項，探討高科技戰爭中「戰略態勢評析」的新方法，以利未來之野戰用兵。

「戰略態勢評析」在作戰指揮中的意涵與功能

一、戰略態勢評析的邏輯與模式

《國軍軍語辭典》「戰略態勢」的定義為：「在某一時空內（敵我雙方）相對部署與行動，包括兵力、位置與地略形勢等，可據以判斷敵我兩軍在戰略上可能產生之作用或影響²。」因此，「戰略態勢」的功能在「判斷」與「評估」雙方的作戰能力，此與《孫子兵法》〈軍形篇〉以地略為基礎所衍生的「度、量、數、稱、勝」的廟算邏輯如出一轍。事實上，「戰略態勢評析」的運用不僅可上升至戰略階層之上的軍事戰略階層，也可向下涵蓋到戰術與戰鬥層級主要的差異，只是縱長性的幅度不同而已。不論科技如何進步、資訊多麼發達，任何作戰行動之前，「評估」與「判斷」仍為必然之程序；包

1 本文所指的「現代戰爭」與「傳統戰爭」並非是以某一個時間作為判準與區別，而是以遂行戰爭的手段、性質與武器科技在戰場上的運用方式作為區分兩者的差別。通常傳統戰爭屬於正規作戰方式的使用範圍在固定有限的戰場上。現代戰爭的戰場無遠弗界，作戰行動體也包括正規與非正規部隊、人民及媒體等多元結構的行動體。

2 《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頒，民國93年3月），頁2-14。

括「任務分析」、「指揮官狀況判斷」、各參謀的「狀況判斷」等，其目的都是為指揮官下達決心（決策）前，提供完整的敵我優劣形勢的分析。由此得知，「戰略態勢評析」的運用包含了戰略與戰術各個層級，也涵蓋各級專業的幕僚判斷。本文因著重於大軍作戰的戰略層級，故「戰略態勢評析」置重點於指揮者的「評估」與「判斷」方面。

從大軍作戰指揮程序的角度來看，「戰略態勢評析」的用途是為了產生指揮官受領任務後的「指揮官判斷」。通常，大軍指揮官接獲統帥部的任務，為一簡單及原則式的訓令。例如，1991年1月「美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前夕，美國中央指揮部指揮官史瓦茲科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接獲統帥布希（George Bush）總統的指令為「元月15日後，將伊軍驅逐出科威特，以恢復科威特主權之完整³」，至於「如何驅逐」與「如何恢復」則為該司令官的戰略判斷與整體評估之工作。因此，指揮官在接獲「原則式」的訓令後，必須經過詳細算計、推測與判斷，並將原則性的訓令，化為具體可行的戰略指導，才能有效遂行作戰⁴。

作戰指導來自於決策，決策產出的正確性又與對敵情、我軍的評估及判斷，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性。判斷性的問題須經過細密的分析，然而此一分析，又來自於作戰初期階段對戰場狀況有一個明確

的認「知」，才能有效地對「戰略指導」提出正確的觀點。因此，對於如何將「戰略態勢評析」轉變為一種可具體實現的思維活動或計畫作為指導，必須臚列出戰略態勢的相關因素，並從其間找出互動關係，才可確實掌握「戰略態勢評析」的要領。

野略「戰略態勢評析」考量的基本因素有四；第一、敵我雙方兵（戰）力的比較；第二、雙方兵力位置；第三、雙方兵力位置與補給線的關係；第四、爾後的發展等四項⁵（如表一）。

經過四項因素評析完畢後，指揮官概可獲得「有利」或「不利」的結果，其中又可從「利」或「不利」之中產生出最為重要的「關鍵因素」，以作為對下級部隊作戰指導和各參判斷作為之準據。茲將四項因素詳細分析如下：

一、敵我雙方兵（戰）力比較

兵力與戰力的評估為衡量一支部隊作戰能力的基準，也為戰場上雙方戰力優劣尺規中的基本要素。無論作戰前準備或戰爭遂行，任何一方都會設法增強己方力量，以獲取開戰前的有利戰略態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兵（戰）力的比較值其計算標準多以兵員或武器數量多寡為基礎（主因武器所產生的效能概等）。一戰末期德國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將軍提出「總體戰（Der Totale Krieg）」的概念，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於武器科技的精密度與殺傷力大幅提升，作戰距

3 威廉·紐曼（William Newmann）著，《美國總統與國安決策過程》（臺北：國防部編譯，民國96年10月），頁255～256。

4 薄富爾，鈕先鍾譯，《戰略緒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68年），頁56～58。

5 《陸軍軍隊指揮—戰略之部》（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64年7月），頁62～63。



表一 戰略態勢評析分析表

因素	評析	內	容
敵我雙方兵（戰）力		有形：兵力數量、武器裝備、訓練、領導、作戰效能 無形：士氣、意志、思想、武德	
雙方兵力位置		是否出現戰略翼側、是否控有有利的戰略位置	
雙方兵力位置與補給線的關係		補給能量、補給輸具、補給路線、補給線與作戰是否成垂直或平行	
爾後發展		依據上述三項推斷爾後作戰的進展	
結論：1.戰略態勢的結論可評斷出有利或不利的態勢。 2.從有利(不利)中找出獲得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素。 3.關鍵因素的解決之道則為指導作戰全局的作戰概念。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離與範圍又遠超過以往的戰爭限度，兵（戰）力的計算方式除了考慮兵力數量與部隊組織、編裝、訓練外，尤須思考人民及社會之民心、士氣、精神、意志、紀律，甚至思想意識型態等，凡此種種因素都被列為敵我雙方戰力比較的因素⁶。

二、雙方兵（戰）力位置

所謂兵（戰）力「位置」之意，依據約米尼（Antonio Jomini）的解釋，應包括戰略線、戰略要點（域）、決勝點及目標區等要項⁷。戰略線是由其地理位置或臨時機動性的因素而產生的；地理性的戰略線又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永久性的重要地理線，也可稱之為戰場上的決勝點；第二種則是因為它的位置是聯繫兩個戰略點，所以才有戰略上的價值。上述戰略線之所以會成為重要的評估價值，在於這些點或線因其位於作戰行動的要衝，

就是所謂永久地理性的戰略要點，亦是兵家必爭或必守的作戰位置。凡先敵占領或取得者，即可先期掌握戰局，獲致決定性影響⁸。例如，臺灣地形中大家所熟知的大肚山與大肚溪，該地區即是所謂的戰略線或戰略要點。另外，有些位置是由於敵人的主力位置和我軍對敵運動的方向都具有很微妙的關係，因為這是一些偶然性的重要地域，所以稱之為戰略要域⁹。

所謂「決勝點」與「目標區」，視雙方將來可能在某一地點或區域，將會進行決戰（主力與主力的格鬥）的區域謂之決勝點。通常，一個戰場上的決勝點又以地理上顯著的點和線，是較具有重要的永久性價值。例如在中國大陸長江中游的武漢三鎮，它可扼控長江與漢水的匯合點，且為鄂、湘、贛、皖、豫諸省主要的交通中心，因而誰控領該戰略區域，即會對整個

6 胡敏遠，《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6年4月），頁91。

7 約米尼，《戰爭藝術》（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6月），頁81～82。

8 胡敏遠，《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頁92。

9 約米尼，《戰爭藝術》，前揭書，頁82。

戰局產生決定性的結果，無論攻者或防者都會盡全力奪取（防守），在此一區域較易形成主力對主力的決戰。

正規作戰的用兵思考，必須仔細區分那些因素會對我方的用兵產生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即須研判我軍應該或不應該向該地區進出。誠如孫子對地形的認知一樣；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用兵與地形不可分開，在於不同位置上的部隊即會產生出不同的能量，依據不同的能量，其所產生出的效果即會不同。是故，不知山川險易之形，就不能知地形對用兵之利害；而用兵正確指導必須發揮地形之利，始可制勝，乃兵家必修之課也。由此得知，兵力位置與敵我雙方部署的陣線與地形有密切關係，彼此間所形成的安全及威脅程度，即為兵力位置的價值。

三、雙方兵力位置（戰略位置）與補給線的關係

所謂「戰略位置」是指一支軍隊在一段固定時間內，為了能占領一個比實際作戰幅員更廣的作戰正面，此一正面的占領將會對敵方造成威脅。至於所謂的補給線與作戰位置的關係則是指：一支軍隊為了達到決勝的目標，或是為達成某種重要的機動目的，將作戰基地設置在與戰略位置

相關的地點上，而補給線與作戰位置即可形成極為密切的關係¹⁰。因為，後方基地是前方部隊戰力的策源地，相對的也構成前方部隊必須確保的要域，無形中補給線變為前方部隊的致命處。有戰略翼側¹¹的一方其作戰線（補給線）必然將遭受威脅；反之則無。是故，作戰過程中各造都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採用各種謀略手段，努力地消除（或威脅）彼此的戰略翼側。

四、爾後發展

「爾後發展」必須根據前三項因素的評估結果，再經由仔細的歸納推理，才得出合理的推論；以目前敵我雙方所擁有的既成條件（事實），若雙方都以原來的兵（戰）力採取極可能的行動下，推斷可能會造成何種結果。本項因素之所以會列為戰略態勢評析的思考因素，主因前三項因素屬於「既成事實」，為一種經驗性的結果；是建立在既成事實的歸納邏輯上¹²。此種推導式的思維方式雖有其預測的成分，但卻是提醒用兵者，可能會從爾後發展的思考中，其思維會逐漸浮現出最為關鍵的因素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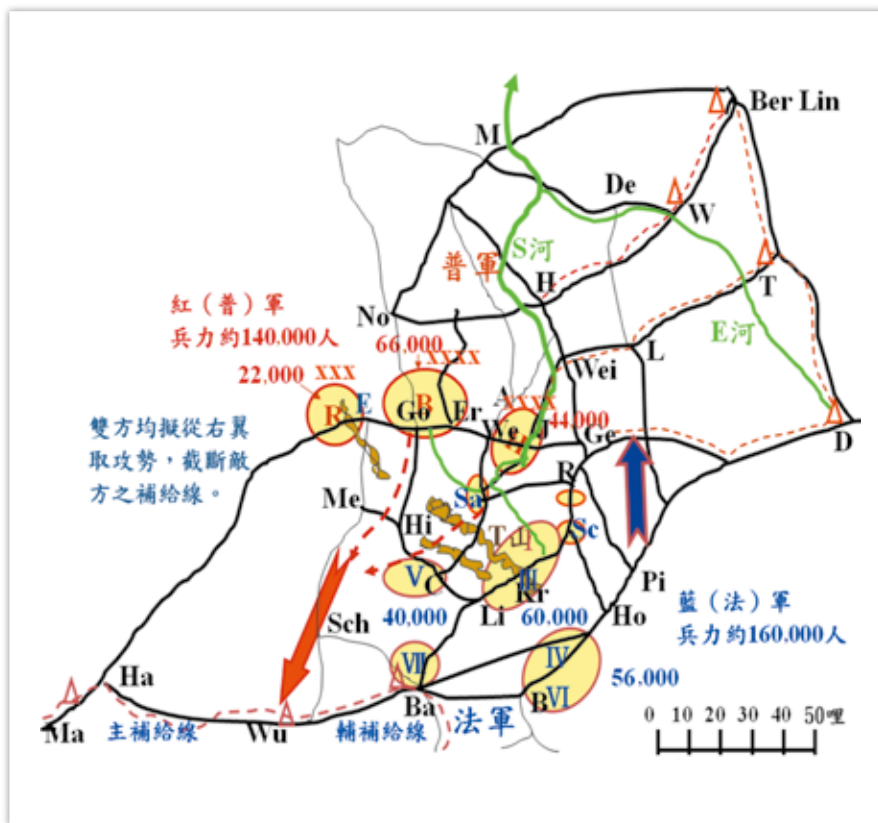
戰史說明，1806年10月普法「耶拿戰役」爆發前夕，普軍及法軍主力都企圖從敵方的左翼攻擊對方，雙方的目標都設定對方的戰略翼側，以達切斷對方補給線，迫敵於不利狀況下決戰之目標¹³（如圖一）。法軍指揮官拿破崙（Bonaparte

10 胡敏遠，《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頁93～94。

11 所謂的「戰略翼側」是指敵作戰正面靠近我方補給線，謂之我有「戰略翼側」的危機。戰略翼側的形成多因本身在兵力部署上的疏忽，其次即是判明敵情的發展，甚至無法得知地形對敵我雙方的兵力布局對戰爭可能造成的影響等因素，所形成作戰前可能對我不利的戰略態勢。

12 胡敏遠，《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6年4月），頁94。

13 《野戰戰略教材第一部》（桃園：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編印，民國99年9月），頁27～29。



圖一 於1806年10月8日普法兩軍勢圖

資料來源：《野戰戰略教材第一部》（桃園：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編印，民國99年9月），頁27。

Napoleon) 對當時的戰略態勢評析如下：

(一)雙方兵力狀況

普軍兵力為140,000人，法軍為160,000人，法軍兵力略優於普軍。

(二)兵力位置及作戰地區道路狀況

普軍正面約100哩，兵力較分散，僅一條道路可供兵力集中及威脅敵補給線；而法軍正面則約70哩，兵力較集中，易發揮統合戰力，且至少有兩條路線可供機動。法軍距敵補給線約50哩，但普軍則約100哩。法軍僅須2日的時程即可威脅普軍的戰略翼側，而普軍欲達到威脅對方補給線之目的則須4日的行程。由此得知，兵力位置法軍較普軍有利。

(三)作戰正面與補給線的關係。

普軍三條補給線幾乎都與作戰正面概略平行；法軍則有兩條補給線，其中的輔助補給線與作戰正面垂直，可隨時替代主補給線。對補給線的威脅程度而言，普軍由於缺乏保護其補給線（戰略翼側）的措施，致使受威脅程度較法軍為高。所以就風險程度而言，法軍較普軍為低。

(四)爾後發展

綜合上述三項因素評定，法軍戰略態勢為「極有利」。其理由即是法軍兵力優勢、兵力集中位置較易威脅與切斷普軍補給線。法軍指揮官依戰略態勢評斷後的結果，其全般戰略指導應立即對普軍左翼取攻勢，威脅其戰

略翼側、壓迫普軍於不利狀況下決戰而殲滅之。

上述因素及戰史說明，可以理解「戰略態勢」評定的思維邏輯及其在作戰指揮上的重要性。然而，這些評估要項並非固定不變，它會隨著戰爭型態與科技武器裝備的進步，會持續不斷深化與調整，之後會呈現出更為精確的評析結果。其次，綜合評析前述四項因素之後，在指揮者心中會出現一個較為明晰的「有利」或「不利」的圖廓。再順此「有利」或「不利」的圖廓發展下去，指揮者即可找出與當前景況最為關切的關鍵因素；由此關鍵因素切入，則可判斷出當前最應急切且須解決的問題所在。爾後的戰略指導就可以

依據關鍵因素，化為下級部隊可以執行的行動方案，須再經過一連串的指揮程序；從任務分析、各參狀況判斷、下達命令、擬定作戰計畫、實施、執行、督導……，這些過程的首要工作，即是指揮官能對敵我戰略態勢作出正確的評析。

現代戰爭中「戰略態勢評析」考慮因素的肆應性與挑戰性

一、高科技武器對「兵、戰力」的新意義

高科技的戰爭型態與傳統戰爭最大的不同為高科技武器及精密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戰場的透明度及武裝部隊的作戰效能大為提升¹⁴。由於高科技武器的運作需要高素質的操作者，始能將精密武器發揮效能，現代化軍隊必然包括高科技武器裝備與高素質人員等兩項。因而，兵（戰）力的思考與衡量已非單純的「量」的思考，其中更包括了「質」的意涵。

「質」與「量」的戰力計算，對野略戰略態勢評析產生極大影響。傳統野略用兵因為雙方「質」的差距不大，甚至概等，多是以「量」化的方式來評量敵我的戰鬥能力，也就是會依敵我兵力之多寡、強弱與武器性能來評雙方優劣形勢。然而，在高科技戰爭中用兵的主體已從純粹武裝部隊的概念擴溢出來，傳統兵（戰）力以「量」化方式的概念必須重新界定。換言之，戰力的評估除了以其「質」的加權求出量化數據外，還須包括多元參與戰爭主體的意見。另外，無形戰力除考慮敵我雙方的作戰意志、愛國情操、智慧之外，更須思考敵國整體綜合國

力、國際干預力量等會影響戰力的因素，才能對「兵（戰）力的評量」有正確的認識。

二、正規戰與非正規戰並用的「兵力位置」之意涵

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的作戰概念與用兵，屬於完全不同的方式。正規作戰的目標是以敵人的有生力量及明顯的戰略要域為主；非正規作戰則包括特種部隊的作戰方式，及使用其他武裝力量（泛指各種武裝力量或叛亂團體、游擊隊……），特種部隊的作戰方式則以特殊地形或特定的目標為主，通常會指向敵軍可能於任何地方出現的威脅源；例如敵人的首腦、政治人物或重要軍事設施。而使用其他非正規部隊的武力作戰，一般會配合正規部隊或特種部隊的作戰，共同實施。因此，在作法上正規作戰強調攻城掠地，並須派軍隊占領所獲取之目標地。然而，非正規作戰對於上述的需求，則不強調。正規作戰的武裝力量有明確的服制可資識別，而非正規作戰則包括正規部隊、特種部隊及非正規部隊等。

由於未來戰場勢必為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並存的場景，兵力位置的價值會依優劣不同形勢有所不同的作法。例如兵力處於優勢時，強調如何對敵軍形成包圍與壓迫，反之則需強調隱密與奇襲的部署。其次，部隊機動速度與精準射擊能力的提升直接影響兵力位置的重要性。例如美國在1998年提出其2010年的聯戰願景，即以「快速機動」與「精準打擊」作為其未來戰場的作戰方式¹⁵。部隊機動速度與遠距

14 胡敏遠，〈論析野戰戰略謀略的運用〉《陸軍學術月刊》，第46卷510期，民國99年4月，頁91。

15 於下頁。



精準射擊能力的提升已成為未來思考兵、戰力位置的重要因素。因此，無論兵力強弱或採取正規或非正規作戰，兵力位置的運用必須深遠的考量部隊數量大小、快速機動能力、遠距精準射擊能力等各種可預判或可知的因素相互配合，否則會面臨因判斷錯誤而陷入指導不當，貽誤戰機之困境。

三、精準式後勤對「補給」與用兵概念的衝擊

美軍聯戰教則已將精準式的後勤視為三軍聯合作戰的重要準則之一。「精準」與「快速」實與武器性能、作戰型態都具有密切的關係，彼等關係亦隨著科技工業的進步而不斷翻新，因而愈是精密的武器，其技術的維護愈是困難；其次，各式先進武器裝備愈是精密、複雜，其脆弱性相對升高¹⁵。因此，欲使此等精密武器裝備始終保持良好作戰效能和運作常態，就必須實施不間斷地技術投資，並不斷地增加保養和維修的工作能量，才能確保精準與快速的部隊能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戰能量。例如，1990年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美軍一架F-16戰機在起飛前必須進行45分鐘的技術維修和保養。F-117隱形戰機所需的保養和檢測時間會更長，在戰爭期間美軍曾對30多艘多國部隊的艦艇進行了1萬多次的維修¹⁶。由此可見，現代戰爭為維繫新式武器的性能與作戰效率，其投注資源之大，付出辛勞之苦，可見一

斑。因此，精準快速的補給維修速度與作戰效率是確保部隊能否順利達成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

其次，現代戰爭中由於物資消耗遽增、戰役節奏加快以及作戰機動性不斷增大之下，作戰過程中各方對維修與補給的依靠程度日益加深。維修與補保計畫本屬於作戰行動中「術」與「技」的階層，然而維修與補給速度若不夠快速或精進，將直接影響大軍用兵的速度，而速度與時間則是野戰用兵計量的重要手段。故維修與補給計畫必須有效地利用各項資源與民間設備，例如現行的「物流管理」、「宅急便」、「委外補保」方式等的增加，都是評估敵我後勤補給能力的重要因素，亦是現代戰爭實施戰略態勢評析的新思維。

四、多層行動主體的爾後發展

傳統野戰戰略態勢評析的「爾後發展」是依前三項的評估結果，預判前三項的事實對爾後的影響及可能帶來何種後果。事實上，預判是指揮官的「認知能力」，它是會隨個人軍事素養、價值觀、戰爭觀與變動不拘的戰場環境等因素，產生出的預知能力。因此，爾後發展的謀略行動會隨著上述轉變成為一種持續發展的過程，它是一種流動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指揮者會保持著對自己的反思性控制，而這種控制能力即是對外在變動因素下，不斷地將變動因素內化到指揮者的思

15 漢斯·賓尼迪克（Hans Binnendijk）編，《美國軍事轉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9月），頁v。

16 胡敏遠，〈論析後勤補給的新思維對野略用兵的影響〉《陸軍學術月刊》（桃園），第512期，民國99年8月，頁144～145。

17 于國華，《現代進攻戰役主要問題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6月），頁51。

維邏輯之中，才有可能將態勢的評估預判到精準與確實。

現代戰爭中由於行動體的多元化，使得爾後發展的預判已非軍事指揮者可以單獨決定。雖然，戰略態勢評析的前三項為軍人的專業，然而自韓戰時期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因戰地指揮官發言不當，而免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聯軍統帥職務。現代戰爭與傳統戰爭最大之不同，戰爭最後的決定（爾後發展）權必須尊重多元主體參與者對戰爭爾後發展的評估。例如1991年波灣戰爭，地面作戰的兵力使用及其奪取最後目標的決定¹⁸，由於政治因素，聯軍地面指揮官在進抵巴斯拉（最後目標）之前，即依政治決定而終止軍事行動，此舉固可解釋為軍事已經達成政治之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政治因素對戰場掌握程度」大增，相對的也增加對軍事指揮官的約束力，「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傳統觀念已不再適用於未來戰場。

野略「戰略態勢評析」的新概念與當代之應用

一、「決策管理」與「淨評估」思維下的「戰略態勢評析」之應用

「決策管理」與「淨評估」都是一種

策略管理的分析模式，兩種模式都有共同的立基點；他們分析的重點不但與軍事上之敵（競爭者）、我（自己能力），外在環境（在戰場上稱之為天、地、水）等思考方式一致，亦與企業規劃理論具有相同的邏輯，都是遵循「目標、淨評估、戰略、戰術／政策」的線性邏輯發展¹⁹。

「淨評估」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為達永續生存目的，所進行的一種分析的方法，它會發生在組織任何一個層次，也會根據問題性質與需要，決定分析過程中所使用之技術²⁰。所以，「決策管理」與「淨評估」都與「戰略態勢評析」具有相同的思維邏輯。

由於「決策管理」與「淨評估」運用範圍以策略規劃居多，是以達成組織「目標」為最終目的。策略的規劃其邏輯重在目標制定、環境分析、資源評估、策略選擇、組織發展、結果評核等之管理流程²¹。正規作戰的野略態勢分析對整體的資源評估與組織的發展較少著墨，但現代戰爭中任何作戰行動都與整體的資源分配與組織的後續發展具有深遠關係，所以在現代戰爭中，戰略態勢的評估必須加入「決策管理」與「淨評估」的組織與管理的新概念，才能使戰略態勢評析更具生命力。

18 1991年1月中旬起聯軍對伊拉克發動空中攻擊，經過1個多月的空中轟炸（「沙漠風暴」行動）後，伊軍仍頑強不願屈服。2月24日聯軍決定發動地面攻勢（「沙漠軍刀」行動）。聯軍地面作戰構想是採取一翼包圍，以正面的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兵團配合美軍海軍陸戰隊1個軍的兵力為正面牽制部隊，另以兩個機動軍及空降軍為包圍部隊，向巴斯拉取攻勢前進，最後須切斷伊軍南部軍團與巴格達的補給線，並迫伊軍於不利狀況下決戰而殲滅之。然而，此一地面戰略構想並無法達到最後目標，主因聯軍在進抵巴斯拉前方約80公里處，聯軍接獲美國總統之令停止前進，並宣布戰爭結束。

19 潘東豫，《淨評估》（臺北：經典傳訊出版社，2003年6月），頁64。

20 潘東豫，《淨評估》，頁82。



二、兵、戰力為資本轉換的新概念

現代戰爭中由於武器射程不斷加大，精準彈藥的殺傷力大幅提升下，對於「戰場」的概念不宜僅將其視為一個「地方」的概念而已。因為，戰場是一種「力量、時間與空間」不斷相對變化的「動態」概念。戰場上力量的對比因雙方的權值與權重的對比，時時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對於戰略態勢隨時隨地都可能造成改變，所以應將力、空、時框架在一個場域的概念之中，所有參與戰爭的行動者（Actor）須不斷地運用其現有的資本（兵、戰力），創造其有利之「勢」，進行一場可以獲勝的布局行動。尤有甚者，因資本（兵、戰力的意涵）具有再創造性，應將兵、戰力的概念轉變為運用武裝部隊戰力之強弱（屬經濟資本的範圍）、武裝部隊的角色與渠在政治環境中的地位（為社會資本的概念）及用兵法則是否較敵方優越（是文化資本的運用）等三項重要因素²²。

是故，運用廣義的武裝部隊作為載體的構想，兵、戰力的評估不僅是單純「部隊」的運用而已，必須結合國家的所有資源、社會能量以及學（知識）界的文化資源做整體之規劃。上述三種力量（資本）

的連結，使得「兵、戰力」的概念會在一個更大的場域中進行串聯，這個「場域」會從過去單純的武裝力量的競技場（戰場），進化為一個更為寬廣的「場域」（社會、國家及國際環境……）之中。換言之，軍事力量的算計必須將武裝部隊放置在國家的綜合國力之中，兵、戰力的估算與評定才能與整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環境相互結合。

三、兵力位置實為「場域」轉換的意涵

戰略態勢評析的「兵力位置」應視為一個「場域」的結構概念。因為，兵力位置所形成的「勢」（無論是自然之勢或人為之勢），實際上就是一個場域（Field）的概念，也是一個整體的意涵。場域可視之為力量關係的系統，是結合了各個行動體（敵軍、我軍、友軍……的力量與智謀）、各式各樣的自然因素（天候、地形、障礙……）、以及環境因素（國際局勢的轉變、友邦國家的背離或倒向等），場域於是變成了一個開放與動態性的作戰空間，其邊界也是一種浮動形式的「動態邊界」（dynamic borders）²³，而場域的界限也會變得變動不拘、複雜難測，場域內／外的差別必須視實際的力量較量狀態才能加以經驗性地

21 潘東豫，〈淨評估與國家戰略規劃系統〉《淨評估與國家安全研討會》（臺北：臺灣綜合研究院，2001年5月），頁43～44。

22 兵戰力、指揮官及兵法為一支武裝部隊形成的三項必要條件。本文中所指的經濟資本在兵學領域中為武裝部隊的兵戰力，兵法及兵學知識為文化資本，指揮官兼俱的稟性與素養，此一涵養會受到各種資源（各項資本）及所處的位置（場域之意）而不斷成長與調整。因此，「兵戰力」的概念運用在武裝部隊上，不僅是指揮官的修為，它更是一種場域、資本、戰場空間、國家環境、實踐等相關聯的因素交織串聯而成的動態過程。

23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142.

判定²⁴。

職是之故，兵力位置的研究屬於力量、時間與空間對於雙方可能造成的改變都列為思考的架構分析之中，行動者才可能會有一個整體性的思維框架出現。換言之，兵力位置的研析可視之為一種整體性結構的謀略，此種研究是一種判斷性、綜合性、總體性、全程性與反思性的思維程序，而非僅是靜態性的兵力數量與地形問題的思考。

四、聚焦式的後勤概念對現代戰爭的啟示

現代戰爭中，由於大量精密武器與高科技裝備的使用，使得後勤的角色已較傳統戰爭更為凸出。精準的修護與補給速度由於受到高科技與價值昂貴雙重因素的影響下，成為大軍野戰用兵的主要限制因素，但也為現代的軍隊提供了一個「機會」；如何創造更有效的快速補保力量，成為戰場上戰勝敵人的重要籌碼。

未來大軍作戰後勤整合與補給線的配合，將必須從「線（補給線）」的概念，向系統化的「立體概念（軍民合作整合式）」方向轉折。簡言之，要運用精準式的後勤或高效率的補保系統以作為大軍用兵的思考。首先，在後勤方面必須與敵人進行高強度、多樣化的安全性抗衡，也要在變化萬端的戰場上，與敵進行鬥智，方能善用後勤與補給手段創機造勢。其次，整合式的後勤必須與各個戰務系統相互結合；運用資訊化系統將後勤與各個系統進行鏈結，則可有效運用各項資源；最後，整合式與精準式的後勤將會運用各種手段與作為，以達成確保補給線的安全為目標。

結 論

「戰略態勢評析」的主要功能，是為指揮者在受領任務後能快速明瞭全般狀況，作為指導全局的策略管理模式。如同其他管理的策略模式一樣，在設法達成目標的同時，並講求安國全軍之道，亦即孫子所謂「勝乃可全」也。戰略態勢的策定重要的是從錯綜複雜的狀況中理出與當前軍隊最為關鍵的因素，以形成作戰指導的全般概念。這種活動會隨著戰爭的複雜程度及戰場規模大小之不同，可以是集體的也可以是個體的策略制定行為。更重要的是由於戰況的變化瞬息萬變，「戰略態勢評析」是一個反覆不斷進行的思維理則，方能達到「因敵而勝」之要求。

本文研究發現，傳統的野略「戰略態勢評析」的四項考慮因素可適用於野戰戰略階層的指揮官判斷及參謀狀況判斷的思維邏輯。然而，受高科技武器裝備、現代化策略管理、資訊化戰場情報準備等知識衝擊下，戰略態勢評析必須增加一些新的概念，例如兵、戰力的估算須轉變為「資本」增減的概念、兵戰力的位置亦須朝向「場域」的意涵轉換、後勤更須具有「精準式」與「效益式」的後勤觀念，才能使戰略態勢的評析增進其生命力。另外，有關現代戰爭中增加了多元的行動體，因此作為最後一項的「爾後發展」因素，也就不能僅考慮純軍事的因素，而必須思考關於可能影響戰爭結果的因素，才能在達成最終決策過程中，保有較為寬廣的視野和務實的方法，為指揮官的全般指導提供完整的藍圖。

24 Ibid., p. 138.